

※採訪報導※

我的求學研究之路 ——專訪日本京都大學高田時雄教授

余蕙靜 * 採訪整理

二〇〇九年九月至二〇一〇年一月，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邀請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高田時雄教授，擔任一學期客座教授，講授「敦煌學與語言學」。高田教授師從小川環樹（京都大學文學部）、李嘉樂（Alexis Rygaloff，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EHESS），一九八〇年獲得法國語言學博士，二〇〇五年以《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獲京都大學文學博士銜。能以日、中、法、英等文字直接撰寫論文，研究領域涉及漢語史、音韻學、西域語言文字史、文獻學、書誌學、東方學暨漢學史、基督教來華史等領域，至目前為止，已發表上百篇學術論文。並精通漢語、英語、法語、德語、藏語、回鶻語等等，同時俄文也有接觸，因此在復原藏語、于闐語、粟特語、突厥語中的漢字借字、轉寫字等方面頗有建樹，二〇〇三年高田教授聯合國際相關研究機構，在京都成立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ILCDS），擔任幹事（後被推為幹事長），委員會兼賅中、日、法、英、德、俄、美及臺灣等國學者，復經常受邀至海外各大學擔任客座教授¹，是國際知名的漢學研究學者，也是敦煌學專家。筆者有幸於二〇一〇年新春伊始，採訪高田教授談其治學研究的經歷，並彙整成以下內容，深信對有志於漢學研究的同好後進，定有所助益。

本文經高田時雄教授修訂，特此誌謝。

* 余蕙靜，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基礎教育中心國文組專任副教授。

¹ 因研究的關係，高田教授與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北京大學、中國國家圖書館、蘭州大學、復旦大學、首都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單位均保持長期的合作關係。

一、研究漢學的啓蒙

高田時雄教授於一九四九年出生於日本大阪市，每當有人問起他為何會研究漢學這個問題時，高田教授始終不曾察覺背後有什麼特殊原因，但現今再次回想起來，他認為可能是就讀高中時，正值中國大陸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全世界掀起濤天巨浪般的震撼。此一運動的目的在顛覆並重新建置一套新中國的各項制度，當時日本傾左刊物曾大篇幅地報導，再加上北京廣播電臺空中傳送的革命訊息，更讓數千里以外的知識分子，驚覺中國正面臨著五千年以來始無前例的變化。那時的高田教授雖然僅僅是高中學生，卻已經從這樣的變化刺激中，催生出想要進一步了解中國的動機。

一九六八年三月高中畢業前夕，高田教授確定將從事漢學方面的研究，由於日本各大學採單獨招生考試，特別是大部分國立大學，舉行考試日期幾乎都定在同一時間，因此考生必須在各所學校做出選擇。京都大學的漢學研究歷史久遠，同時也是關西地區第一學府，因此高田教授決定報考京都大學，並順利進入文學部（類似臺灣學制的文學院）就讀。

二、京都大學的影響

（一）重視外語

京都大學的前身之一，是舊制第三高等學校，簡稱為「三高」，創辦於明治維新時代。當時的日本政府積極向西方學習，銳意改革，因此政府所設立的學校，均十分強調學生的外語能力，以至於日後演進為日本國立大學的學制當中，規定學生進入學校的前兩年，在分部不分學系的情形下（即類似大一學生按分數志願進入學校，只分配至各院，至大三才進一步分學系），各部學生必須在學校「教養部」開列的課程中修習學分。「教養部」會針對不同部的學生設計所要選的課程，該部負責承擔大學教育的入門及基礎教育工作，目的在培養所有學生都能擁有普遍性的學術視野，並強調外語及跨文化的理解能力。特別是文學部的學生，規定要選修兩門外語，當時學生們選修外語的比例，第一是英語，其次是德語，第三是法語，高田教授選修的是英語及德語。初入大學的高田教授即表現出對語言學高度的興趣，他

不只鑽研漢語及外語的部分，同時也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語言——如藏語，因此當他日後再到法國攻讀博士期間，看到法藏敦煌遺書中，有藏文字母書寫的漢文材料，即以此做為博士論文的内容，此便是受惠於學習藏語的努力。

（二）學風獨立自由

京大文學部於一九〇九年（明治三十九年）創建，由哲學科、史學科及文學科等三科組成，文學科設有「支那語支那文學講座」，後改為「中國語中國文學講座」。高田教授進入文學部當年，研究中國文學著名的漢學家——吉川幸次郎教授自京都大學文學部榮退，由於受到吉川教授的影響，京大文學部的學生修習中國文學方面的較多，語言學的相對較少，以高田教授當年為例，進入文學部兩百位左右的學生，選修漢語的只有三、四位，高田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高田教授表示，京都大學的傳統，自創校以來，就是主張尊重學生自主，以期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現在京都大學自製的 DVD 學校介紹中，仍然標榜著自首任校長木下廣次以來，校方一直樹立著尊重自由研究、自由教授、自由學習的教育理念，培養學生獨立自主的學習能力。尤其是高田教授就讀大學期間，正是日本一九七〇年代左派學運最為活躍的時期，因此四年上到的課並不多。儘管如此，仍有幾位學者令他印象深刻，如在教養部上課時，尾崎雄二郎教授開設的漢語學課程，高田教授形容尾崎先生是一位天才型的學者，雖然寫的文章不多，但是對於語言學的一些問題，不僅有獨到的見解，並且看法也很透徹。

其次，日本各大學開設的中文專業課程當中，原本並沒有教授聲韻學方面的課程。第一位對聲韻學有所研究，並且正式開設課程者，是倉石武四郎博士²。二戰

² 倉石武四郎（1897年9月21日—1975年11月14日）出生在新潟縣高田市，父親倉石昌吉是明治維新時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澤諭吉的學生。1921年，他在東京帝國大學支那文學科畢業。同年到中國江蘇、浙江沿海進行考察，回國後考上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的特選公費生，但一年之後即中途退學，於1922年進入當時日本中國學的中心——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師事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等京大名師。1926年擔任京都帝國大學講師，1927年升任助教授，1928-1930年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學。回國後繼續在京都帝國大學任職，並兼任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前身）研究員。1939年以《段懋堂的音韻學》獲文學博士學位。同年，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1940年兼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1949-1958年，任東京大學專任教授及日中學院院長等職。參見〈倉石武四郎——Wikipedia〉，引用網址：<http://ja.wikipedia.org/wiki/%E5%80%89%E7%9F%B3%E6%AD%A6%E5%9B%9B%E9%83%8E>。及〈倉石武四郎——百度百科〉，引用網址：http://baike.baidu.com/view/975116.html?tp=0_11。

之前，他在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兩校同時任教，二戰之後，回歸東大。他對日本漢語研究曾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培養許多優秀的語言學方面的研究生。一九三九年他以《段懋堂的音韻學》獲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這份博士論文雖然在當時沒有出版，但是一直留存在京大的圖書館，高田教授也曾經借出影印閱讀，獲益良多。

一九七二年高田教授自京都大學文學部畢業，繼續攻讀研究所，同期同學中，仍然只有他一個人是研究上古漢語領域，他也是小川環樹博士³指導的許多學生中，第一位專攻語言學的研究生。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六年碩、博士班期間，高田教授積極參加以指導教授小川環樹博士為顧問的「均社」活動。「均社」是京大和關西地區，一些研究漢語音韻學的年輕學人定期舉辦的讀書會；同時為發表成員的研究成果，並發行《均社論叢》小雜誌，高田教授也在此刊物發表過幾篇論文。

三、到法國留學

（一）遇見伯樂

當時西方研究漢學的重鎮在法國，因此大學及研究所時期，高田教授除了鑽研漢語和少數民族的語言，也兼修法語。幾年下來，閱讀文章不成問題，但因缺少會話的對象，因此法語表達能力仍有待加強。為了爭取可以到法國唸書的機會，高田教授在博士班第二年即報考法國政府舉辦的留學考試，當時擔任主考官的，是法國文化部的一位文化參贊，同時也是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院語言所，主持東方語言研究所的李嘉樂教授。李教授本身是俄裔法籍，其先祖為舊俄的白俄羅斯人，至其父親時移民法國，他在巴黎受教於漢學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的門下，並於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期間到中國工作，因此精通中文。李教授在與高田教授進行最後一關的口試時，即明白告知高田教授，說他的法語語言分數不夠。假設當年換作是其他的主考官，很有可能會顧慮高田教授將無法勝任未來法文的學習環境，而

³ 小川環樹博士（1910年10月3日—1993年8月31日），京都府京都市人，為日本地質學家小川琢治之四子，1932年自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畢業，1934-1936年至中國留學，專攻語言學，師事語言學大師羅常培與趙元任。1938年回到日本，先後擔任東北帝國大學講師、助教授、教授，1950年回京都大學任教，至1974年退休。參見〈小川環樹——Wikipedia〉，引用網址如下：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rlz=1R2AMSA_zh-TW&q=%E5%B0%8F%E5%B7%9D%E7%92%B0%E6%A8%B9&btnG=%E6%90%9C%E5%B0%8B&aq=f&aqi=&aql=&oq=&gs_rfai=。

不予錄取。但是獨具慧眼的李教授知道，眼前這位學生要到法國唸書的目的，是為了精進漢語研究，因此當下決定捨棄法語，改採漢語口試。果然相談之下，李教授對高田教授大為激賞，最後將高田教授的總成績，在當年考生中名列前茅——高田教授便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踏上夢寐以求的法國留學之路，李教授也成為日後高田教授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

（二）大開眼界

來到法國的高田教授，在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東方語言研究所就讀博士課程。院內研究風氣類似日本，採開放自由的方式，教師不干涉學生的研究情況，每兩個星期，由李嘉樂教授主持的研究團隊，會召開一次學術研討會，由所裏的研究生輪流提出報告，研究團隊的教師再給予意見，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並解決問題的能力。高田教授分別也在法國索邦大學 (Université Paris-Sorbonne) 中專攻文獻歷史學的第四院讀書，受教於麥克唐納夫人 (Ariane Macdonald) 的藏文文獻學課程，以及在法國最高學府——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受教於知名漢學家謝和耐教授 (Prof. Jacques Gernet, 1921-)。當時的每位教授，都將自己正在進行的研究，與研究生相互討論，即便這些研究也許並不見得是研究生日後要從事的領域，但對於視野的開闊及思辨能力的提升，無形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高田教授來到法國之前，已在京都大學跟著四位老師學習四年的藏語課程。在這四位老師當中，有一半是佛教學家，因為佛經原本是由梵文寫成，後來傳到西藏，藏人為便於閱讀，於是將梵文逐句轉譯為藏文。雖然梵文原典佚失，但依據藏文佛經能夠復原梵文原典，因此近代佛學注重藏文的研究。適逢京都地區始終沒有藏人教授藏語，因此遂由佛教學的老師承擔兼授藏語課程。但是這樣的藏語傳授，有時並不容易呈現出藏語社會的民族情感與文化結構，一直到了法國，為配合博士論文的撰寫，高田教授進入巴黎東方語言學校⁴修習藏語，教授課

⁴ 東方語言學院，全名「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亦簡稱「東語學院」(INALCO)。最早開始於柯爾貝 (Collbert) 所創辦的青年語言學校，1795 年法國大革命時期，國民公會 (Convention) 重新成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進而演變至今。校史悠久，是法國最著名的語言學校，下設非洲、南亞、東南亞、太平洋、日本、中國、阿拉伯語、歐亞大陸、希伯來語、俄羅斯語、中東歐、美國語言與文化等系，以及其他相關職業性質的專業課程，如國際貿易、國際研究、外國語法語及跨文化交流等。見〈國立東方

程的兩位教師是來自印度達蘭薩拉 (Dharamsala) 的西藏人士，這一點是他前往西方求學之前，所始料未及的樂事。

四、再回到日本

(一) 共創「青年敦煌學派」(Young-Ton)

一九八〇年高田教授完成論文，獲法國博士學位，隨即束裝返國，回到京都大學，繼續博士班尚未完成的學業。同年並在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及東京外國語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兩地，擔任臨時研究人員性質的「共同研究員」，並與其他年輕學者，包括森安孝夫⁵、熊本裕⁶、武內紹人⁷、吉田豐⁸等在關西地區共同發起「青年敦煌學派」的活動。參與的個人專長都是從事中亞少數民族語言文獻的研究，五人以各自研究的優勢相互補充，彼此砥礪，破除以往因語言限制而產生的障礙，拓展了研究取材的領域。在當時的敦煌學中異軍突起，從而使日本敦煌學與絲路古代文化研究邁進了一個新的境界，頗受學界重視，直到三十年後的今天，成員也都成為各個領域的學術權威。

(二) 母校任教

一九八一年三月，高田教授自京都大學博士班修業結束，四月分即應聘至「日

語言文化學院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引用網址如下：http://www.askedu.com/cn/info/info_4_arc52500.htm。

⁵ 森安孝夫 (1948-)，文學博士，1972 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1975 年，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東洋史學專業碩士課程修了。1981 年東京大學東洋史學專業博士課程修了。1982 年任金澤大學文學部副教授，1984 年任大阪大學文學部副教授，1994 年任大阪大學文學部教授，1998 年任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至今。主要研究方向是中亞史、西藏史。其主要著述有《回鶻摩尼教史研究》(大阪大學刊，1991 年)、《關於回鶻和吐蕃的北庭爭奪戰以及此後的西域形勢》(1973)、《藏語史料中出現的北方民族——DRU-GUY 與 HOR》(1977)、《吐蕃在中亞的活動》(1984)、《中亞史中的西藏——吐蕃在世界史中的位置》(1987) 等多篇論著。見〈森安孝夫——互動百科〉，引用網址如下：<http://www.hudong.com/wiki/%E6%A3%AE%E5%AE%89%E5%AD%9D%E5%A4%AB>；及日本大阪大學文學部森安孝夫教授網頁介紹，引用網址：<http://www.let.osaka-u.ac.jp/toyosi/members/moriyasu/index-j.html>。

⁶ 熊本裕 (1948-)，現為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⁷ 武內紹人 (1951-)，語言學專家，現為神戶市外國語大學教授。

⁸ 現任京都大學教授，為粟特語專家。

本學術振興會」(JSPS)(文部省下設研究機構,類似臺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擔任「獎勵研究員」(類似「博士後研究」)。短短半年的時間,即發表多篇擲地有聲的學術論文⁹,因此同年十一月,便受聘至北海道國立小樽商科學大學擔任助教授,教授漢語課程。高田教授持續發表研究論文,一年半後,重返母校京都大學,在教養部擔任助教授,後因尾崎雄二郎教授的退休,在一九八九年轉任人文科學研究所,並在一九九七年升任教授至今。

(三) 主持「研究班」

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自成立以來,即相當重視團隊研究(「共同研究」),其具體做法就是「研究班」的成立,這項風氣自創所以來,八十年間持續不輟,也是全國唯一首創。所謂的「研究班」,即所內的正教授須選定研究主題,主持為期三年至五年的定期報告討論。成員由主持的正教授負責邀請,通常包括所裏的助教授、博士班研究生,以及校外感興趣的專家學者,平均每個班約二十位左右的成員,每隔兩週開一次討論會,最後將成員的研究成果集結成冊出版。京大人文所「研究班」的成立,影響了日本其他各大學紛紛起而仿效,甚至包括海外中國大陸的北京大學。高田教授主持過許多的「研究班」¹⁰,對培育後進不遺餘力,並累積許多研究成果。

當筆者問起,至目前為止,有無特別欽佩的中方及日方的學界前輩時,高田教授表示,在他之前,日本研究語言學的專門學者並不多,有關這方面的前輩論著,在他還是研究生的期間,大致都已拜讀過,獲益甚多。最佩服的有倉石武四郎教授及高田教授的指導教授小川環樹博士,還有尾崎雄二郎教授等,都是影響他非常大

⁹ 如: Distinction des deux médiales de la division III de l'ancien chinois dans les documents en écriture tibétaine,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No.9 (1981.5), 36-44。Sur la naissance des tons du tibétain, *Journal Asiatique* CCLXIX, 1-2, (1981.6), 277-285。高田時雄:〈チベット文字で書かれた寒食詩の斷片〉,《均社論叢》(1981年10月),頁66-86。

¹⁰ 高田教授主持的「研究班」,按時間先後分別有:「中國語史の資料と方法」班(1990年4月至1993年3月)、「中國語音韻史の研究」班(1993年4月至1998年3月)、「十六・十七世紀アジアの言語接觸」班(1998年4月至2002年3月)、「王玄策研究」班(2002年4月至2006年3月)、「西陲發現中國中世寫本研究」班(2006年4月-)等。以上請參見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高田時雄教授個人網頁,網址:<http://www.zinbun.kyoto-u.ac.jp/~takata/>。

的前輩。倉石教授指導的弟子當中，如漢學家族出身的賴惟勤¹¹，以及已故著名學者橋本萬太郎、東京大學的平山久雄等等，都是在日本漢語學界當中，很有成就的前輩。中國學者方面，由於高田教授開始接觸漢學最主要是從漢語史開始，那時他最佩服的就是羅常培與趙元任。特別是對趙元任博士有關語言學方面的理論見解，認為不僅觀點獨到，而且能深入其他學者所未能深入的部分，所以令他深感佩服¹²。

五、目前從事之著作

高田教授從事學術研究將近四十年，發表過上百篇的學術論文，完成許多著作，此次來到臺灣，除了講學，另外仍有一本待完稿的書籍要撰寫。起因是日本岩波書店委託，內容有關中國古籍《大唐西域記》的研究。高田教授談到，近幾年日本陸陸續續發現的古抄本非常多，《大唐西域記》是其中之一¹³，這些問世的古抄本非常受到國際漢學的重視。以《大唐西域記》為例，當時書內有許多以當時的唐代音翻譯梵語的音譯詞，因此許多學者認為，以這些音譯詞去追溯唐代的音韻，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佐證。

再者，《大唐西域記》是玄奘自印度歸來第一年所完成的著作（唐太宗貞觀二十年，646），當時玄奘將遊歷印度、西域各國十九年的資料，先交由弟子辯機進行彙整，辯機彙整後，呈給玄奘的是一份初稿。初稿再經玄奘修改後，成為獻給唐太宗的進呈本。現今流傳的《大唐西域記》，便是玄奘整理的進呈本。當時辯機的初稿並不為外人所知，惟有同在譯場工作的幾個和尚知情。然而後來辯機因疑與唐太宗第十七女高陽公主有戀情，在貞觀二十三年（649）被皇帝下詔處以腰斬後，譯場內的人便閉口不談此事。辯機的初稿雖然並未流傳下來，但當時其他的僧人在撰寫

¹¹ 其先祖為日本江戶時期著名的歷史學及漢文學家的賴山陽（1780-1832），著有《日本政記》、《日本外史》等。賴惟勤教授在 20 世紀 60 年代已著手進行漢語音韻學研究索引編寫。參見〈賴山陽——百度百科〉，引用網址如下：http://baike.baidu.com/view/384326.htm?fr=ala0_1。

¹² 有關這部分，可參考高田時雄：〈東洋言語學の發展と近年の動向〉，《東方學》第 100 輯（2000 年 9 月），頁 218-228。

¹³ 參見高田時雄著，高啟安譯：〈京都興聖寺現存最早的《大唐西域記》抄本〉，《敦煌研究》，2008 年第 2 期，頁 47-48。

書籍時，曾引用辯機初稿的內容。

一般認為，日本發現的古抄本《大唐西域記》，是直接從唐代傳本流傳過來的，敦煌寫本中雖然也著錄部分《大唐西域記》的內容，但為數不多，僅僅有幾個片段而已。相較之下，日本古抄本的意義就非常重大，可以利用它與其他現行的《大唐西域記》做一對照，當中自然會發現一些前所未有的資訊¹⁴。

《大唐西域記》雖然不是玄奘譯經的書籍，但是也包含在與其他梵文轉譯漢字佛經之列，到了唐高宗時期，高宗規定，所有新翻譯的經典，必須再經修改，於是命令大臣組成一個團隊來完成這份工作，《大唐西域記》也在修改的書籍當中。高田教授的看法是，若是以時代甚早的日本古抄本和高麗藏本的《大唐西域記》等與現今流傳的他本對照，不難發現，高宗時代的重新修訂，是經過一系列有組織有規律的更動，所以高田教授認為，日本古抄本的《大唐西域記》，是唐太宗時代玄奘的進呈本，而現今收錄在《大藏經》內的《大唐西域記》，是唐高宗時代的修訂本，上述這些推論，他將詳細書寫在預計出版的新書當中，讀者可以拭目以待。

六、未來待完成之研究

由於高田教授長期以來，一直從事敦煌寫本的研究，因此他很想寫一本全面性有關敦煌方面的書，題目暫定為「十世紀敦煌語言生活史」。希望能還原十世紀時，敦煌地區的啟蒙教育，以及當時日常生活當中和語言相關的社會事件。他已經累積了一些資料，目前正著手進行，大概預估要花上十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此外，高田教授接下來還準備開展有關社會語言學方面新領域的計畫，分別是

¹⁴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請參見以下高田時雄教授所發表的相關論文：〈現存最古の《大唐西域記》寫本〉，《いとくら》第3號（2008年1月），頁10-11；〈京都興聖寺現存最早的《大唐西域記》抄本〉（高啟安譯），《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頁47-48；〈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表啟に關する一問題——玄奘と長命婆羅門〉，《佛教文獻と文學——日臺共同ワークショップの記録2007》（東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フロンティア實行委員會，2008年），頁219-230；〈高宗期における《西域記》テキスト變改について——日本古抄本による檢證〉，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フロンティア「奈良平安古寫經研究據點の形成」主辦國際シンポジウム「漢譯佛典研究の新時代」《講演資料集》（2008年12月6日），頁105-119。此外，高田教授本次來臺客座期間，也曾以〈日本古抄本《大唐西域記》與其價值〉為題，於2009年12月13日，受邀至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作專題演講。

「洋涇濱英語」(Pidgin English) 及「洋涇濱俄語」(Pidgin Russian) 的研究。前者的資料已經陸續蒐集了十年之久，起因是高田教授曾在歐洲訪問過許多圖書館，當時曾發現許多有關英漢對照詞彙的書籍，他乍看之下，覺得書內的英語，並不是真正的英語，剛開始感到有些奇怪，後來才恍然大悟，了解到這就是大家所謂的「洋涇濱英語」。

高田教授談到「洋涇濱英語」最早是源自於廣東澳門的簡化葡萄牙語，由於葡萄牙人來到中國的時間比英國人早，他們自澳門上岸，和澳門的廣東人展開對話時，當時所使用的並不是正統的葡萄牙語，而是形式結構比較簡單的簡化葡萄牙語——即所謂「洋涇濱葡語」(Pidgin Portuguese)。後來來到中國的英國人越來越多，英國人也需要和當地人對話，於是英國人便把當地人已經習慣的「洋涇濱葡語」中，葡語的部分換成英語，其他仍沿襲原來的對話結構，這就是「洋涇濱英語」的由來。當時廣東地區，為了彼此做生意的需求，許多書店經常販售「洋涇濱英語」的會話手冊刊本。

中英鴉片戰爭之後，上海成為五口通商之一，部分住在廣東地區的人來上海經商，因此「洋涇濱英語」便開始在華人與英國人之間廣泛使用。目前中國大陸有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這些問題，也發表了一些論文¹⁵，但是高田教授根據後來又找到許多的相關的資料，覺得還可以再進一步寫出一本說明有關「洋涇濱英語」起源及形成比較全面性的書籍。

而「洋涇濱俄語」的研究，卻是高田教授最近的新發現，他表示早年國際漢學學者們，到國外找資料，大多數都到英、法、德等國，到俄國的很少。其實俄國人到中國的時間，比其他國家的人都要早，尤其璦琿條約（清咸豐八年，1858）簽訂之後，俄國人得到清廷許可，得以在北京設立東正教的教堂，許多俄人為了傳教的理由來到北京，其實背後真正的目的是學習漢語，兼蒐集中國當時的情資，那時俄國的首都是聖彼得堡，因此清代以前的中文資料，在俄國大多集中在聖彼得堡的圖

¹⁵ 如：謝軍：〈洋涇濱英語論〉，《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頁100-102；施光：〈淺析洋涇濱英語的形成及其特徵〉，《南京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頁60-63；劉文慧：〈中國歷史上的洋涇濱英語〉，《遼寧稅務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頁43-44；歐陽偶春、鄒亮：〈廣東洋涇濱英語的產生、發展和遺忘〉，《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頁80-82等。

書館。高田教授以前也曾在義大利的圖書館蒐集資料，時間長達五年之久。因為義大利是耶穌會的總部，過去許多耶穌會的傳教士來中國傳教，所以義大利當地留存有許多關於中國的資料，但近幾年來，高田教授也已將蒐集資料的重心轉往俄國。那時他訪問俄國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在該所波波娃 (Dr. Irina F. Popova) 所長的陪同之下，同時參觀聖彼得堡大學 (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的圖書館，在館藏中看到一本中俄會話的寫本冊子。由於高田教授略曉俄文，當下他即辨識出寫本內的俄文非正式的俄語，而斷定這些寫本的俄文就是「洋涇濱俄語」，也可以稱之為「貿易俄語」。起因在於清雍正五年 (1727)，中俄雙方簽訂恰克圖條約 (Treaty of Kyakhta)，劃分彼此貿易與疆界的範圍，兩國商人定期通商貿易，「洋涇濱俄語」的寫本便是為了進行對話的產物，當時在恰克圖 (Kyakhta) 地區的書店販售，但隨著時代的改變，作為工具性的手冊不再為人所用，遂漸漸匿跡於書肆。

高田教授發現這些手冊後，當下即邀請波波娃所長一起合作這項研究，由所方提供掃描檔案。筆者訪談時，曾在高田教授的電腦中瀏覽了這些檔案，這些寫本內的中文字跡大都十分秀麗，呈直行排列，漢字字體較大，左邊為俄語拼音音注。有趣的是，高田教授發現，「洋涇濱英語」刊本的英語拼音是廣東方言，但是這批聖彼得堡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中俄會話寫本手冊裏，俄語的音注卻是山西方言，並非北京官話，可見當時在恰克圖邊境經商的中國商人中，實以晉商居多。

相信不久的將來，高田教授的大作完成之後，對於十八世紀中俄社會語言學方面的研究，一定會有不凡的貢獻。

七、對後輩學人之建議

以高田教授一路走來的研究歷程，當筆者請教他談談對後輩從事漢學研究者的建議時，高田教授誠懇地指出，多學習外語，是最重要的途徑。如此一來，研究者的眼界才會更為開闊，也比較有機會發現新資料，如果只是在傳統的漢文資料當中找尋研究題材，研究的成果其實是很有限的。新的學問隨著新發現的資料建立起來，這是一百年來學界公理的所在。以往中國的漢學研究，最缺乏的還是學者語言能力的突破，導致收集國外文獻的不足。近十年來，中國大陸已有許多學者紛紛出國，到英、美各地蒐集資料，陸續也有新的發現，但是深度與範圍還是不夠，最根

本的原因，還是在於學者的外語能力仍有待精進。所以高田教授特別深切盼望，中國大陸以及臺灣的年輕學者，趁年輕時期多學習外語，對於自己研究能力深度與廣度的提升，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他以日本為例，說明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許多當時的高等學校，都要求學習外語。二戰以前的「高等學校」（類似大學前的預科），學校幾乎一半以上都安排語言課程。因為當時帝國時期，曾經有過一段時間，許多大學的課程是由外籍教師直接以外語授課，因此政府要求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前，先至「高等學校」就讀，學習好外語之後，再進入大學學習專業學科。學生自大學畢業後，再到歐洲繼續深造，返國後就可以留在大學任教。如此再過十幾年，留學歸國的學者就可以替代原先外籍教師的授課。這項重視外語的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還存在日本各大學，比如日本大學學制中的「教養部」，就是以前高等學校的轉型。

必須學習外語的另一點，是因為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國際漢學的標準語言是法語，以法國漢學大師伯希和為例，高田教授曾著手將伯希和生前發表的全部論文加以影印裝訂，輯成二十卷（未出版）。但是這些論文當中，只有少部分被翻譯成中文，伯希和論文的價值，其實是在每篇正文之下，附帶有大量的註腳說明，這些說明包含許多漢學界的重要訊息，有心研究漢學的學者應該將伯氏文章逐頁翻檢，以伯氏在註腳內所提到的問題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再開發新的領域。很可惜上述這個部分，目前尚未受到年輕中國漢學研究學者的注意，語言的受限，應該是最大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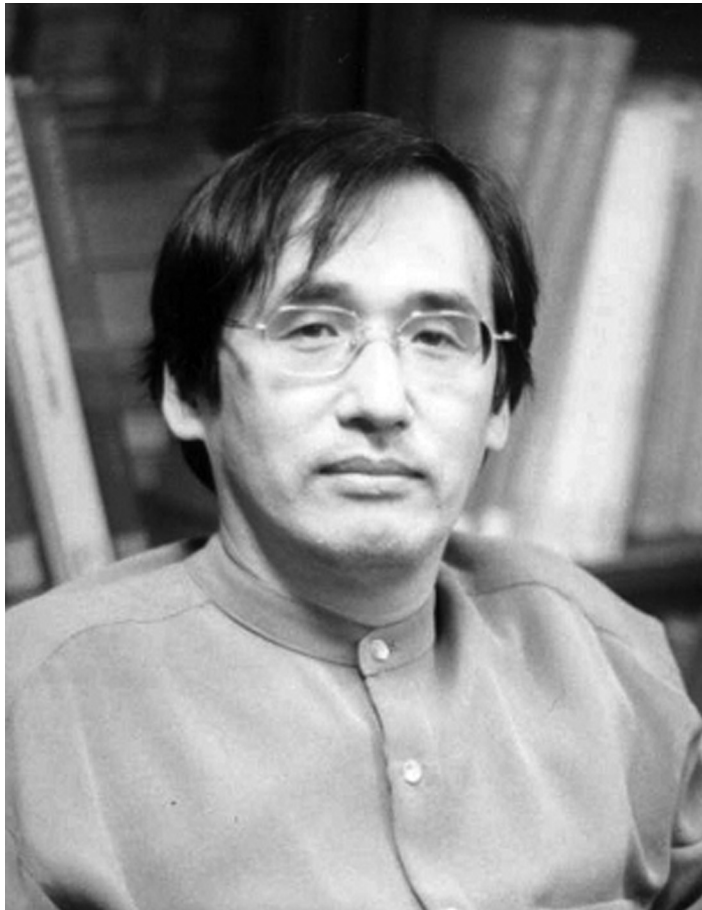
八、比較日本、臺灣兩地研究漢學的特色

日本學界因為很早就注意到上述的問題，校方呼籲從事漢學的研究生積極學習外語，這是日本漢學研究界重視語言所具有的優勢。但相對地，日本各大學未將小學的課程列入文學部修習課程，學生學習的漢語，也是從現代漢語著手，不似過去先從閱讀中國古文開始，因此學生們普遍解讀文言文的能力很弱，自然也就無法從事中國古代方面的研究，這是目前日本漢學界研究日趨衰退的關鍵因素。年輕一輩的學生不喜歡閱讀古文，京都大學在這方面還算好，像其他大學的漢學研究重點，近幾年都已轉至明清之後，特別是寫一九〇〇年代以後的論文比較多，這是日本各大學現在漢學研究的普遍概況。

因此高田教授很佩服臺灣各大學中文系，將小學安排為必修課程。學生在學習之初，先經過有系統的訓練，將來在解讀古籍上，自然容易得多。反觀日本卻沒有這樣的學習傳統，即使是從高田教授的學生時代直到今天，日本各大學文學部仍未有教授聲韻、訓詁等課程，學生們若有興趣，也只得靠自己私下主動學習，這一點正是臺灣學界在培養漢學人才上，難能可貴的優良傳承。

後 記

從下午二點鐘踏進高田教授的研究室，到五點左右的結束採訪，高田教授始終展現平易近人的親和力，以流利的中文，不疾不徐的態度，述說他的治學理路。京大人才濟濟，幾位執學界牛耳的大老，早已打響中國文學研究所的名號，以至於我原先想從人的角度，切入他在漢學研究的學習歷程，高田教授卻轉從這些前輩著作對他的啟發，回應我在這方面的提問。訪談當中回首望去，看到研究室書櫃及書桌上滿山滿谷的資料，更讓我感受到這三個小時的難能可貴。著作等身的他，其實根本不需要我的虛詞贅語，然而即便如此，身為國際知名的漢學家，最初聽到受訪邀請時，當下的反應竟然是從耳根泛紅到臉頰，謙遜地直搖頭，說他沒有什麼好值得採訪的。只可惜拙筆無法呈現高田教授精闢獨到的言談，讀者在閱讀拙文之後，可以自電腦點選網址：<http://www.orientalstudies.ru/eng/images/personalia/pdf/takata.pdf>，進入〈高田時雄著作目錄〉PDF 檔，定能了解高田時雄教授自一九七九至二〇〇九年以來，同時以法、日及中文三種語言所發表的研究成果，也許可以彌補我行文的不足。



高田時雄教授近影